

美国政治的“非自由主义民主” 转向及其影响^[1]

赵明昊

【内容提要】特朗普第二任期从政治理念、权力架构等方面大力推动美国的变革,“非自由主义民主”在美国兴起。特朗普力图削弱以“多元、平等、包容”理念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利用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维护和扩展其权力基础,实现保守民粹主义理念的长期化、制度化;试图深入改造美国政府体制,借助“紧急状态”大幅扩张总统行政权力,打击“深层政府”,损害美国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和地方政府权力,加强对军队的掌控,对美国高校、媒体等进行压制。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民粹主义体现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版图的深刻变化,法治、权力制衡等民主原则受到挑战,一种美国式的威权体制正在显现。“非自由主义民主”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以及中美关系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美国政治 特朗普政府 非自由主义民主 门罗主义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赵明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26)01-0095-26

[1] 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特朗普 2025 年 1 月再次执政以来，大幅调整内外政策，力图通过推动一场“革命”，实现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从思想基础看，美国右翼智库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牵头制定了对特朗普第二任期至关重要的政策方案——“2025 计划”（Project 2025），主张彻底废除“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建立一个高度集权、意识形态纯粹的总统权力体系，大力宣扬“第二次美国革命”的理念。^[1]从施政实践看，特朗普的“革命”体现在社会理念、政治文化和权力架构等各个层面的重塑。例如，特朗普试图通过对性别认同、反犹主义、国家官方语言、移民遣返等议题的操弄，削弱以“多元、平等、包容”（DEI）理念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拓展保守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影响力，导致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极端性、对抗性和暴力性持续增强。又如，特朗普高度重视扩张总统权力，试图改造美国联邦政府体制，挑战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分权制衡，重塑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着力加强对美国军队的掌控力，并对美国高校、媒体和法律界等公民社会力量予以强力压制。

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等美国政治学者指出，特朗普试图推动形成“美国式威权体制”，即不同政党仍然会通过选举展开竞争，但当权者将通过滥用权力打击反对派。^[2]从发动“革命”的条件看，特朗普 2017 年首入白宫时只是一个政治素人，而其第二任期拥有了更坚实的权力基础、更完备的施政构想以及更具忠诚度的执政团队。随着特朗普 2.0 时代大力推进所谓“革命性”的政策议程，“非自由主义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或将成为美国政治的新常态。这种态势将给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带来冲击，对中美关系也将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一直是美西方国家标榜自己政治体制

[1] James Politi and Alex Rogers, “Inside the radical Trump-backing group behind Project 2025,”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29,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8488e9b9-52be-4c0a-8c32-b2e1928de851>.

[2]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The Path to American Authoritarianism,” *Foreign Affairs*, Vol.104, No.2, 2025, pp.38–39.

特色的惯用概念。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后 30 多年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纷争与裂变加剧，“自由”与“民主”这两者之间显现脱钩之势。较早探讨“非自由主义民主”问题的是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他在 1997 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自由主义民主”不仅意味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还包括法治、分权以及对言论、结社、宗教和财产等基本自由权利的保护；而“非自由主义民主”是指虽然一个政治体制仍然保持定期的选举，但对于领导人权力的宪制约束减弱，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损害。扎卡利亚原本是希望通过“非自由主义民主”这一概念，描述冷战结束以后罗马尼亚、阿根廷、哈萨克斯坦等国的政治进展，阐释自由主义和民主体制之间的复杂张力。^[1]当前看，要观察“非自由主义民主”问题是否在给人以“成熟民主”幻想的美国已经出现，需要回应一个关键的问题：美国是否正在经历所谓的“民主衰败”（democratic backsliding）？

近些年来，在全球化受到质疑、贫富差距拉大、族群矛盾加剧、技术进步加速、媒体生态“极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非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在西方世界不断扩散，“民主衰败”已成为美欧比较政治学界中的重要研究议题。一些政治人物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公开推崇“非自由主义民主”模式。^[2]列维茨基和另一位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民主是如何死亡的》一书中指出，当代民主的死亡很少通过军事政变等剧烈方式发生，更多是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领导人逐步侵蚀民主体制来实现的。他们还提出了识别威权导向型政治人物的四个关键行为指标：用言行拒绝民主游戏规则、否定政治对手的合法性、容忍或鼓励暴力、表示愿意限制对手（包括媒体）的公民自由。^[3]这一分析框架为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推动变革中的“非自由主义民主”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6, 1997, pp.22-43.

[2] 参见 Marc F. Plattner, “Il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Struggle on the Righ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30, No.1, 2019, pp.5-19。

[3] 参见 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18, pp.9-10。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扬-维尔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进一步揭示了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府执政通常具有的三个典型特征：企图劫持国家机器、腐败和“大规模裙带关系”以及系统性地打压公民社会。穆勒指出，民粹主义者声称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唯一代表，将政治对手污名化为“人民的敌人”。^[1]这种排他性的政治逻辑本身就与倡导多元主义的所谓“民主原则”相悖。当民粹主义与威权倾向结合时，就会产生对“民主制度”的侵蚀。

需要指出的是，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所谓的“新兴民主国家”或欧洲国家的“民主衰败”，而对于美国这样的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如何产生威权转向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本文通过将“非自由主义民主”概念应用于美国案例的分析，揭示意识形态极化、社会分裂、制度漏洞等因素相互叠加，势必加剧“民主衰败”。通过从意识形态、制度变迁和宏观影响三个层面进行阐释，本文力图呈现美国“非自由主义民主”兴起的图景，为理解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威权转向提供分析路径，为学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美国“非自由主义民主”兴起的思想土壤和社会基础

“非自由主义民主”潮流在美国的延展具有很强的内生性驱动力。从美国政治的演进历程看，虽然“自由”“平等”“基于宪法的法治”等构成了所谓“美利坚信条”（American Creed）的重要基础，但在政治实践中却不乏等级制、政治暴力、腐败和权力的滥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鸿沟。^[2]在美国，对于“何谓自由”“何谓民主”的争论一直存。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民主体制”的内在张力越发突出。

[1] 参见 Jan-Werner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p.4。

[2] [美] 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先萌奇、景伟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第361页。

在民主党和左翼政治人士的长期推动下，性别认同、文化战争、维护堕胎权等成为美国政治的重要议题，遭致右翼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身份政治在美国愈演愈烈，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政治极化以及政党内部的分化重组不断演进。在意识形态和政党政治变局的背后，是美国中产阶级萎缩、工薪阶层家庭经济困境加剧的现实。近年来，很多美国选民对“觉醒自由主义”（woke liberalism）及其倡导的 DEI 理念感到极其不满，对非法移民、白人遭到“反向歧视”等问题甚为担忧，这为特朗普“重返白宫”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其赢得 2024 年美国大选标志着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日益主流化。凭借这股势力的支持，特朗普彰显了“革命性”的施政风格。截至 2026 年 1 月 20 日其再度执政满一年，特朗普共发布了近 230 个总统行政令和白宫政策备忘录，特别是其在打击移民方面的强势做法以及在媒体、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被认为开启了一场“反觉醒”的战争。正如右翼民粹主义代表人物、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白宫首席战略师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所言，“特朗普执政的每一天都将是雷霆之日（day of thunder）”。^[1]

“非自由主义民主”在美国的兴起，是建立在保守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三重构造之上：一是传统保守主义的民粹化改造提供了政治动员的基本逻辑，二是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提供了文化认同和道德合法性基础，三是技术精英的右倾化提供了经济资源和治理理念支撑。这三种力量的融合与互动，构成了“特朗普革命”的思想根基，为“非自由主义民主”潮流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基础。总的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内政治议程，体现了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杂糅，其实质是以民粹主义改造保守主义，而白人至上主义、基督教民族主义、技术右翼（tech right，也称科技右翼）思想等意识形态则成为保守民粹主义的主要元素。

第一，特朗普试图借助民粹主义对保守主义进行改造。“让美国再次

[1] Tara Suter, “Bannon: Every day of Trump term will be ‘day of thunder’,” *The Hill*, February 6, 2025, <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5130262-bannon-every-day-of-trump-term-will-be-day-of-thunder/>.

伟大”源自里根在1980年美国大选中的竞选口号，而特朗普的很多执政理念与里根式的保守主义有着密切关系，而“非自由主义民主”与美国保守主义政治的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特朗普的再次执政是基于保守民粹主义势力的支持，这股思潮和政治力量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所谓进步左翼意识形态的抵制和反对，他们认为左翼政治精英实际上“仇恨美国”并将自己的政治观念强加于人，而特朗普可以让左翼为其“错误和谎言”付出代价。^[1]美国保守主义是一种“情境性的意识形态”（situational ideology），具有很强的反制性（reactive），“当人们害怕习以为常的社会将不复存在而做出反应时，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2]

特朗普在政治上的异军突起，可以被认为是对美国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潮流的一种反制。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很大程度是延续了美国当代保守主义旗手人物、《国家评论》杂志创始人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等人所主张的白人权利至上及其对自由主义、左翼精英的批判思想。自上世纪50年代起，巴克利开始表达支持种族隔离制度以及“需要对掌控大学、媒体的自由主义者和那些不宣扬基督教的教授们发动一场战争”的态度，他的“强硬右翼”倾向重塑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并深刻影响了里根等共和党政治人士。深谙操弄媒体之道的巴克利与特朗普之间也存在很大的相似性。^[3]美国的保守主义演进具有代际更替的特征，里根时代的宗教保守派崛起、小布什时期的新保守主义外交革命、茶党运动的草根反抗、特朗普主义的民粹转向等，不断重塑着保守联盟的构成与边界。^[4]当前，

[1] Daniel Yudkin and Stephen Hawkins, “The Four Types of Trump Supporter,” *The Atlantic*, January 24, 2026,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2026/01/trump-roles-supporters-categories/685706/>.

[2] 徐海娜、姚寰宇：《美国保守主义的演进、现状及困境》，载《美国研究》2023年第2期，第102页。

[3] Jack McCordick,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Who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rump,” *The New Republic*, June 3, 2025.

[4] 庞金友：《特朗普2.0时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可能趋势》，载《国外理论动态》2025年第3期，第101—102页。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试图推动一场新的保守主义革命，一种“沉默的大多数”的政治运动，将其自身界定为真正遵循美国宪法的力量，宣扬摆脱自由派强加的“政治正确”，并展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以及对美国“伟大性”的推崇。

民粹主义的要义是平民对精英的抵制，它代表着一种思维方式、政治动员和社会运动模式。诚如长期研究美国保守主义的学者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所言，“民粹主义并非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逻辑——一种用来对政治进行思考的方式。”^[1]民粹主义政治人物惯于挑动政治分裂，利用选民的被剥夺感、受害者心态(victimhood)与愤怒情绪展开政治动员。以支持种族隔离制度闻名的阿拉巴马州前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Corley Wallace Jr.)等人与特朗普的政治手法有很多相似性。^[2]民粹主义也有右翼和左翼之分，对右翼民粹主义的鼓动和借重是特朗普推动“非自由主义民主”的突出特征。右翼民粹思想脱胎于保守主义，但其具有内生的极端性、对抗性和暴力性，强调“自己人 vs 外人”的区隔，这塑造了“非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文化。右翼民粹势力将自由主义和左翼政治思想视为仇敌，指责全球主义的“达沃斯党”造成美国白人中下层失业困境，坚称美国政治精英操控着“深层国家”(deep state)。右翼民粹势力具有极强的种族主义色彩，白人至上主义成为其核心意识形态元素之一。他们宣称美国白人面临“种族灭绝”危机，将移民问题、多元文化视为对白人主导地位的威胁。这种种族主义话语与反精英的民粹逻辑相结合，构成了特朗普政治动员的重要基础。与传统保守主义者不同，右翼民粹势力极力反对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温和派。为回应右翼民粹势力的诉求，特朗普宣称要“排干华盛顿的政治沼泽”“解构行政国”，并纵容右翼民粹组织针对少数族裔和左派群体实施政治暴力；其开启第二任期后，迅即赦免了因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中袭击警察而被判刑的“骄傲男孩”(Proud Boys)、“誓言守

[1] [美] 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马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7页。

[2] Andrew Stoner, *Fear, Hate, and Victimhood: How George Wallace Wrote the Donald Trump Playbook*,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22, pp.3-6.

护者”(Oath keepers)等组织的核心成员,并称这类激进右翼民粹组织在美国政治中“应有一席之地”。^[1]

第二,特朗普与美国宗教右翼的政治结盟导致基督教民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复兴。宗教因素向来是影响美国政治思潮的关键推动力。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大量白人福音派教徒,而且这一群体的政治忠诚度极高。白人身份认同与基督教信仰在特朗普运动中形成了高度融合,构成了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复合性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强调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地位,更将美国的国家身份与白人基督徒的文化主导权紧密捆绑,将对“传统美国”的捍卫等同于维护白人基督教治下的社会秩序。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得以复兴。民主党政治策略师麦克斯·伯恩斯(Max Burns)认为,特朗普将“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激进的传教士和世界末日预言家相互融合,这一趋势使得福音派选民将2024年大选视为“拯救美国灵魂的战斗”,也促使共和党选民对基督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不断增强。^[2]同时,“2025计划”等所谓的右翼民粹治国纲领也将强化美国社会的基督教信仰作为核心目标之一。

2025年2月,特朗普宣布在白宫专门设立“信仰办公室”,并发布总统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开展打击“反基督教偏见”的行动,由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负责。^[3]这些举措以维护宗教自由、重建社会道德体系为名,实际上是试图恢复美国保守主义所认同的宗教主导政治事务的原则,以反制左翼力量以DEI为由挑战基督教道德规范的态势,增强保守派在白宫决策层、联邦政府乃至地方教育机构等体制中的影响力。一些支持特朗普的

[1] Alan Feuer, “Far-Right Leaders Granted Clemency by Trump Express Desire for Retribution,”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2025.

[2] Max Burns, “America is Facing a Threat of Biblical Proportion: The rise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 *The Hill*, February 21, 2024, <https://thehill.com/opinion/campaign/4479354-america-is-facing-a-threat-of-biblical-proportion-the-rise-of-christian-nationalism/>.

[3] Jason DeRose, “Here’s how Trump’s Faith Office and Task Force Against ‘Anti-Christian Bias’ May Work,” National Public Radio,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npr.org/2025/02/14/nx-s1-5292447/heres-how-trumps-faith-office-and-task-force-against-anti-christian-bias-may-work>.

保守派智库如“复兴美国中心”（CRA，其创始人 Russell Vought 曾参与起草“2025 计划”，现任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甚至提出更为激进的主张，如禁止非基督教的移民进入美国、禁止美国民众获取避孕手段等。美国副总统万斯（James David Vance）也宣称，按照基督教教义，“爱是有次序的”（ordo amoris），这一看法被认为是为新一届特朗普政府遣返移民等政策辩白，也揭示了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政治运作逻辑。^[1] 因此，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表达，更是一种政治身份构建。对内，特朗普强调要捍卫基督教信仰，通过维护反堕胎人士政治权利等方式，巩固基督教选民群体对其的支持；对外，2025 年 12 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将致力于维护美国精神和文化的健康，恢复西方文明的自信，而这无疑是以犹太－基督信仰为基础的。特朗普及其盟友通过将种族、宗教、国家安全议题相互交织的叙事策略，将外部竞争对手塑造为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综合性威胁。这种叙事方式将地缘政治竞争重新框定为文明和价值观的冲突，使得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成为“非自由主义民主”意识形态的动员力量。

第三，技术右翼思想为“非自由主义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美国科技界精英的支持，是助力特朗普赢得 2024 年大选的重要因素之一。彼得·蒂尔（Peter Thiel）、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等硅谷新兴资本家为特朗普竞选筹集巨额资金，并直接介入特朗普执政团队的安排。万斯就是在蒂尔的扶持下先当选国会参议员后又进入特朗普核心圈；萨克斯被特朗普任命为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联合主席和白宫人工智能及加密货币事务主管。这些科技精英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而且也抱持鲜明的政治理念。例如，蒂尔自青年时代便属于保守派阵营，曾与萨克斯合撰《多元性神话：校园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不容忍》一书，抨击进步主义，倡导“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主张抑制福利受益者的过度扩张以及所谓“社

[1] Rachel Dobkin, “Thousands Sign Christian Petition Accusing JD Vance of Going Against Jesus,” *Newsweek*,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newsweek.com/jd-vance-christian-petition-immigration-deportations-2030860>.

会民主”，并曾明确表示其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可以兼容”。^[1]特别是拜登政府不断加大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研发的监管，并在高技术行业推行反垄断政策和 DEI 理念，令越来越多的科技精英感到不满，他们认为“觉醒自由主义”将导致美国科技创新的停滞，并批评民主党政府权力的膨胀。^[2]

在此背景下，一批秉持右翼保守理念的“技术治国者”（technocrats）在美国政治中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他们试图借助技术的力量对美国政治和治理体制进行重塑。一些曾经支持民主党的科技精英如世界首富马斯克（Elon Musk）也倒向特朗普，他在 2024 年大选期间为特朗普提供了约 2.5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在软件工程师出身的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等人推动下，“暗黑启蒙”（Dark Enlightenment）运动在硅谷的影响力日益上升。雅文等人认为美国现行政治体制过于软弱，无力应对各种挑战，主张建立美国式的“CEO 君主制”，推进权力集中，冲破由美国媒体、高校等自由派势力构成的“大教堂”（the Cathedral）。^[3]右翼的技术治国者与民粹主义势力形成共鸣，他们试图遏制左翼的“政治正确”，打击美国的“深层政府”，减少监管束缚，抑制不符合“美国优先”路线的政府支出。此外，有着“浏览器之父”之称的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等技术右翼人物还倡导“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理念，主张为了实现“技术—资本的螺旋上升”（techno-capital upward spiral）可以牺牲公民的自由权利。^[4]在批评者看来，这些右翼科技精英无异于“技术寡头”（tech oligarchy），他们的观念与“2025 计划”的基调高度一致，其权力的扩张将会削弱公民自由、隐私权以及社

[1] Jedediah Purdy, “The Anti-Democratic Worldview of Steve Bannon and Peter Thiel,” *POLITICO*, November 30, 2016.

[2] [英] 克里斯·麦克纳布：《埃隆·马斯克：放眼未来 无所畏惧》，魏翠翠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152—153 页。

[3] Hadas Gold, “Curtis Yarvin Wants to Replace American Democracy with a Form of Monarchy Led by a ‘CEO’,” CNN, May 30, 2025, <https://edition.cnn.com/2025/05/30/politics/curtis-yarvin-wants-to-replace-american-democracy-with-a-form-of-monarchy-led-by-a-ceo>.

[4] Jacob Metcalf, “Trump 2.0 Runs on Tech Accelerationism,” Tech Policy Press, June 26, 2025, <https://www.techpolicy.press/trump-20-runs-on-tech-accelerationism/>.

会自主性^[1]；“美国的技术法西斯主义 (techno-fascism) 不再是硅谷抛出的抽象哲学概念，而是一项正在挑战宪法边界的政策计划”。^[2]

总之，上述保守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三重构造共同构成了特朗普“非自由主义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这些思想元素为特朗普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支持、道德合法性叙事以及治理理念资源。然而，思想基础本身并不足以实现政治体制的转型，关键在于这些理念如何转化为具体的权力实践和制度改造。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力图系统性地重塑美国的政治权力架构，将保守民粹主义理念制度化、长期化。

二、“非自由主义民主”倾向在特朗普 2.0 时代的主要体现

法治、分权制衡、保护公民自由权利被认为是美国政治体制的基石，也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核心要素。然而，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其相关言论和举措展现出“国王”做派，甚至公然声称“我们就是联邦法律”。^[3]在保守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下，特朗普开启了对美国权力架构的系统性重塑。在关税、移民等政策议题上，特朗普多次援引“紧急状态”扩张总统行政权，无视美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国会、州政府的权力。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力图对美国政府进行重塑，增强对司法部等机构的掌控，加大清除美国军队内部的异己势力，对自由派的高校、媒体和社会组织进行打压。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激进、武断，甚至不惜制造冲突和危机来推进自己的施政目标，以实现保守民粹主义理念的长期化、制度化。

[1] Kelly Turner, “From Technocracy to Governance: How Peter Thiel’s Vision Aligns with Project 2025,” Medium, December 23, 2024, <https://kellyjoturner.medium.com/from-technocracy-to-governance-how-peter-thiels-vision-aligns-with-project-2025-a89bbc4826a0>.

[2] Kyle Chayka, “Techno-fascism comes to America,” *New Yorker*, February 26, 2025.

[3] Jonathan Chait, “The Governor Who Stood Up to Trump,” *The Atlantic*, February 21, 2025.

（一）大幅扩张总统权力是美国“非自由主义民主”的突出特征，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对特朗普尚难发挥实质性制约作用

旨在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提供施政路线图的“2025计划”宣扬“单一行政权理论”，主张减少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的制衡。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也支持“单一行政权理论”。2024年7月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在涉嫌“干预2020年选举”的案件中享有一定程度的刑事起诉豁免权，并指示下级法院重新考虑此案，确定哪些行为是不能被起诉的“公职行为”。在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中，3名自由派大法官投下反对票，他们认为，这一裁决对于美国宪法和政府体系中任何人都不应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嘲弄，实际上给予前总统特朗普“他所要求的乃至更多的豁免权”。最高法院在拜登执政时期做出的这一裁决，为总统突破传统的法律和政治约束提供了新的空间，实际上是有利于特朗普的。“2025计划”的主要参与者、被特朗普任命为白宫副幕僚长的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宣称，总统的权力不容置疑。^[1]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共发布了约220项总统行政令，在重返白宫后更加肆意利用这一方式推进政策议程。其仅在上任100天内便签署了高达143项总统行政令，涉及废除出生公民权、冻结对外援助、加大传统能源开采等多个议题，这在美国总统执政历史上创造了新的纪录。特朗普意在采取“大水漫灌”的颁令策略，让反对派应接不暇，也使得司法系统难以及时审查总统的行政令。^[2]

首先，特朗普注重借助“危机叙事”，通过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扩张权力，在贸易政策、移民事务等方面自行其是，侵蚀了美国国会的权力。美联社的一项分析显示，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4个多月内发布的150项行政命令中，有30项援引了紧急状态权力。即便是国会议员和联邦

[1] Charlie Savage, “Trump’s Maximalist Assertion of Presidential Power Tests the Rule of Law,”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25.

[2] Fin Daniel Gomez and Anne Bryson, “Trump sets executive order record in his first 100 days,” CBS, April 29, 2025, <https://www.cbsnews.com/news/trump-first-100-days-executive-order-record/>.

法院法官表示反对或施加阻力，仍然难以有效阻止特朗普滥权。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国会议员包括共和党籍议员曾试图限制总统的紧急状态权力，但其第二任期开启后，类似法案却未能提出。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认为，紧急状态权力的滥用意味着“一条通往专制与压迫之路”。^[1]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也频频以“国家紧急状态”为借口，动用美军展开军事行动，如轰炸伊朗核设施、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等。特朗普的这些做法表明国会对白宫的制衡力量受到明显削弱。

其次，特朗普也常常对司法部门采取藐视的态度。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试图限制特朗普施用关税的权力，特朗普则将该法院做出这一裁决的三位法官抨击为“仇视美国的法官”。2025年6月，保守派法官占据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定，限制下级联邦法院对总统行政令发出全国性禁制令（injunctions）的权限。这一裁定将使得特朗普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张权力、背离法治成为可能，一些美国法官对此警告称，美国已现“帝王式司法”（imperial judiciary）^[2]；而特朗普则称之为“一场针对‘激进的左翼法官’的‘巨大胜利’”。

再次，特朗普对联邦和州之间的权力界限也进行了挑战，其中不乏打击民主党的政治意图。2025年6月以来，为强势推进移民遣返和所谓“维护治安”，特朗普不顾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的反反对，执意在洛杉矶部署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力量，被认为是对宪法第十修正案赋予的州权力的严重挑战，而该修正案是防止总统集权专制的屏障。特朗普还向芝加哥、波特兰、首都华盛顿等地派遣国民警卫队或联邦执法人员，引发相关地方政府的反对。此外，他还打破公职和私利界限，接受卡塔尔赠送的豪华飞机，纵容家人参与稳定币投资，等等，被认为是利用个人地位谋取私利的政治

[1] Byron Tau, Seung Min Kim and Chris Megerian, “Trump Flexes Emergency Powers in His Second Term,” The Associated Press, June 7,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emergency-powers-tariffs-immigration-5cbe386d8f2cc4a374a5d005e618d76a>.

[2] Steven Greenhouse, “The Supreme Court is Cracking Down on Judges - and Letting Trump Run Wild,” *The Guardian*, July 2,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5/jul/02/supreme-court-judges-trump>.

腐败。另据《纽约时报》2025年6月报道，自2024年竞选以来，特朗普的个人财富增加了一倍多，数十亿美元的外国资金流入他家族的房地产和加密货币企业。^[1]穆勒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特朗普的腐败程度无人能及，右翼民粹主义者以“反腐斗士”的名义上台，结果却扩大了“腐败的沼泽”。^[2]

（二）特朗普重视增强执政团队和政府官僚体系的忠诚度，强调要清除“内部敌人”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其执政团队中有大量共和党建制派人士，这些人试图对特朗普进行塑造和控制。在2024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团队注重提前发现和培训忠诚于特朗普本人、认同“让美国再次伟大”政治路线的人，为特第二任期储备“干部”；特朗普在多起诉讼中被判“有罪的刑事犯”，他将之称为民主党对其进行的政治迫害，声讨“司法武器化”，同时还明确释放自己再次执政后将会对政敌进行“报复”的信号，声称美国已被精英和官僚机构勾结形成的“深层政府”操控，并断言“与俄罗斯和中国相比，那些内部敌人更加危险”。^[3]

特朗普第二任期尤为重视增强对司法部、联邦调查局（FBI）、国土安全部等强力部门的掌控，推动了相关联邦机构的政治化以及行政体系的意识形态化。特朗普的巨幅肖像被悬挂在司法部办公楼，这被认为是美国司法部独立性受到侵蚀的标志。^[4]2025年3月，特朗普在视察司法部时称自己是美国的“首席执法人员”，激烈指责“美国政府内部的腐败政客和激进

[1] Ben Rhodes, "Corruption Has Flooded America. The Dams Are Breaking,"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8, 2025.

[2] Jan-Werner Mueller, "Trump's Corruption Is in a League of Its Own," Project Syndicate, June 2, 2025,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orruption-league-of-its-own-by-jan-werner-mueller-2025-06>.

[3] Kristen Altus, "Former President Trump calls the 'enemy from within' more dangerous than any foreign entity," Fox News, October 13, 2024, <https://www.foxnews.com/media/former-president-trump-calls-enemy-within-more-dangerous-any-foreign-entity>.

[4] David Sm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descending into authoritarianism," *The Guardian*, March 22,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ng-interactive/2025/mar/22/trump-administration-authoritarianism>.

分子”，誓言将揭发这些人士的“滔天大罪和严重不当行为”。^[1]因多次粗暴执法造成平民伤亡而引起公愤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甚至被称为“特朗普的私家军”。^[2]此外，特朗普利用“政府效率部”（DOGE）改造联邦官僚体系，打击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不符合“美国优先”路线的机构，如关闭了运营41年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停止给“美国之音”、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等机构拨款等。特朗普还通过削减相关政府机构的预算、解雇支持自由派理念的职业官僚、增加政治任命的公职人员数量等做法，树立特朗普的个人权威，加强对政联邦府官僚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试图对独立机构的人事任命、预算审批、法规制定等增强影响力，涉及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通信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等。

（三）特朗普注重强化对美国军队的掌控力，提拔任用“忠诚的将军”

在所谓的民主体制中，军队的立场和作用至关重要。美国宪法分割了总统与国会对军队的控制权，美国军队一向强调政治中立、军事职业主义，避免军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3]特朗普第一任期，白宫与军方高层关系不睦，特别是对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参联会）主席米利（Mark Milley）“不够忠诚”十分不满。其第二任期为增强对国防部和军队的控制，任命福克斯新闻电视主持人赫格塞思（Pete Hegseth）担任防长，而赫格塞思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明确表示，要从组织层面根除军内DEI。2025年2月，特朗普宣布提前解除时任参联会主席布朗（Charles Brown）的职务，代之以退役空军中将凯恩（Dan Caine）。布朗作为非洲裔

[1] Alan Feuer, “Trump’s Grievance-Filled Speech Makes Clear His Quest for Vengeance Is Personal,”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2025.

[2] 参见 Nicole Markus, “Tom Homan: Newsom is an ‘embarrassment’ for saying ICE is Trump’s ‘private police force’,” *POLITICO*, August 28,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5/08/28/tom-homan-ice-gavin-newsom-00533624>.

[3] 李晓汀：《美国军政关系理论的老问题与新挑战》，载《复旦政治学评论》2019年第1期，第275—279页。

将领，十分重视应对美军内部的种族歧视、性别平权等问题，支持维护军中性少数群体（LGBTQ）权利，被特朗普视为美军内部的“觉醒派”。布朗被提前终止任期，显示特朗普试图通过人事任命对美国军队进行整肃，特别是清除 DEI 理念在美国军队中的影响力。此外，特朗普还解除了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蒂（Lisa Franchetti）、空军副参谋长斯莱夫（Jim Slife）等高级将领的职务，其中，弗兰凯蒂是参联会的第一位女性成员。这一做法遭到五位前国防部长的批评，他们指责特朗普的“鲁莽”之举试图将军队变为党派斗争的工具。^[1] 特朗普及赫格塞思还搞了一次美军驻本土和海外全体 800 多名将领的“紧急集合”，强调推行“去觉醒化”改革，要求所有将领签署“忠诚誓言”并威胁不认同者辞职。面对这种近乎羞辱的“忠诚度测试”，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芬顿（Bryan Fenton）、空军参谋长阿尔文（David Allvin）等多位美军高级将领选择辞职。此外，美国军队一般不从事国内治安，特朗普试图投入美军力量参与强制遣返移民和“维稳”的做法也饱受争议。

（四）特朗普对教育、文化、媒体、法律等领域的社会机构展开压制，推进“反觉醒”政治议程

“2025 计划”牵头人罗伯茨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他在《晨曦：夺回华盛顿以拯救美国》一书中称，民主党和共和党精英共同组成“毁灭党”，其将教育体系视为社会变革的核心，力图掌控美国的公立教育系统、师范学院和大学，以进步主义的文化影响教育机构，摧毁基于圣经、盎格鲁和西方文化的教育传统。^[2] 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借助削减联邦政府拨款、限制招收国际学生等手段，对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常青藤”名校展开打击，要求其应对反犹主义，抑制 DEI 项目。长期以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学占主导地位，特朗普此举旨在攻入这一自由派堡垒，在校园增强保

[1] Lotica C. Baldor, “Former defense chiefs call for congressional hearings on Trump’s firing of senior military leaders,” *The Associated Press*, February 28,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pentagon-defense-chiefs-firings-congress-6da5306a912d578f22bb2239f80502e5>.

[2] Kevin Roberts, *Dawn’s Early Light: Taking Back Washington to Save America*,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24, pp.77–85.

守主义的影响力。对文化界，2025年3月特朗普发布题为“恢复美国历史的真相和理智”的总统行政令，要求在美国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清除“反美国的意识形态”。^[1] 特朗普还将自己任命为约翰·肯尼迪艺术中心理事会主席，并安排多位右翼保守派人士担任理事会成员。对法律界，特朗普以撤销相关机构的安全许可、解除联邦政府合约等方式，对曾经帮助“政敌”的律师事务所进行打压，制造寒蝉效应，这些举措迫使一些知名律所对涉及挑战特朗普政府的法律诉讼畏而远之。^[2]

在美国，媒体向来被认为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但特朗普对相关媒体的打压却不断加码。他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为“民主党分部”，经常用“腐败”“假新闻”等言辞攻击媒体。2025年5月，白宫发布的总统行政令以存在意识形态偏见为由，中止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联邦拨款。特朗普多次称其“老冤家”《纽约时报》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人民公敌”；2025年7月以来，先后宣布对《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等美西方媒体提起总额高达数百亿美元的所谓“诽谤诉讼”。同年11月底，白宫官方网站还上线了一个名为“媒体违规者”（Media Offenders）的新栏目，集中展示那些被白宫认为做出“歪曲报道”的媒体和记者，相关报道也被打上了“偏见”“渎职”“左翼精神错乱”等分类标签。在刻意限制自由派媒体的同时，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等为布莱巴特网、《华盛顿观察家报》等右翼保守媒体大开方便之门。

三、美国“非自由主义民主”兴起的内外影响

特朗普 2.0 时代开启所带来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潮流的兴起，深刻揭示了美国政治面临的挑战。诚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艾尔·弗勒姆（Al

[1] The White House, “Restoring Truth and Sanity to American History,” March 27,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3/restoring-truth-and-sanity-to-american-history/>.

[2] Mark Berma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ues Trump Administration over Law Firm Sanctions,”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6, 202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5/06/16/american-bar-association-sues-trump/>.

From)所言,任何民主的活力都取决于民主制度与时俱进的能力,但美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参议院、选举人团和最高法院等重要机构并没有跟上美国选民结构和政治焦点的变化,“小州偏向”(small state bias)等因素导致美国国家政治出现结构性失衡。^[1]美国特殊的选举制度、民主党的颓势以及共和党的民粹化为特朗普的政治崛起提供了助力。自特朗普2016年首次赢得总统选举之后,美国就进入了长达10余年的“特朗普时代”。^[2]“非自由主义民主”的演进对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国际秩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国内政治看,美国正在经历政治文化的威权化转向,表现为政治暴力的常态化、制度信任的崩塌以及民主规范的持续侵蚀。从对外影响看,美国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转变为破坏者,导致该秩序的结构性的瓦解。这两个层面的变化相互强化,共同塑造着“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的新常态。

(一) 加剧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和暴力性转向

特朗普对美国政治的重塑是深刻的,他不仅直接挑战了立法和司法部门的权威性,也在不断试探突破美国政治运作的权力边界和既有规范。应当看到,美国政治的“特朗普化”在其第一任期结束后就已凸显。^[3]即便是拜登执政的四年,美国在经贸等领域的很多政策也被“特朗普化”。^[4]随着“非自由主义民主”在美国的延展,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将会进一步加剧。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的信任和忠诚度增强,支持总统集中权力。2025年3月公布的路透社/益普索联合民调显示,76%受访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特朗普无视法院裁定继续遣返移民,而只有8%的民主党选民认同这

[1] Al From, “The challenge to democracy—overcoming the small state bias,”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6, 2022,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he-challenge-to-democracy-overcoming-the-small-state-bias/>.

[2] Francis Fukuyama, “What Trump Unleashed Means for America,” *The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8,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f4dbc0df-ab0d-431e-9886-44acd4236922>.

[3] 刁大明:《美国政治的“特朗普化”及其影响》,载《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2期,第55—59页。

[4] “The Trumpification of American policy,” *The Economist*, October 10, 2024,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4/10/10/the-trumpification-of-american-policy>.

一做法。^[1]2026年1月，美国皮尤中心公布的民调显示，37%的受访者支持特朗普，而73%的受访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的执政表现予以肯定，56%的受访共和党选民支持特朗普的一切或大多数政策。^[2]这种民意分化不仅彰显了两党选民在具体政策立场上的差异，更反映了对民主基本原则认知的重大分歧。

在“非自由主义民主”演进的背景下，谎言、阴谋论、“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日益突出，“后真相”“算法政治”等挑战更为复杂。美国民众对国会、法院等民主机构的信心削弱，对政治暴力的接受度则有所上升。美利坚大学教授丹娜·费舍尔（Dana Fisher）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右翼还是左翼群体，对通过政治暴力拯救美国的认同都在增强。^[3]2025年6月，明尼苏达州议会两名民主党籍议员遭枪击，该州州长、2024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沃尔兹（Tim Walz）谴责这是“蓄意的政治暴力行为”。而特朗普本人也曾于2024年7月在参加竞选集会时遭遇未遂暗杀；2025年9月10日，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保守派代表人物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参加右翼团体组织的公共论坛期间遇刺身亡。根据同年9月下旬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等机构的民调结果，30%的受访者认同通过暴力方式确保美国这个国家处于正确的轨道之上，而2024年3月的民调显示，只有19%的受访者同意这一看法。^[4]

值得注意得是，美国国内舆论有关“新内战”的讨论日趋增多，甚至

[1] Jason Lange, “Majority of Americans believe presidents should obey the courts, Reuters/Ipsos poll finds,” Reuters, March 26,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majority-americans-believe-presidents-should-obey-courts-reutersipsos-poll-finds-2025-03-25/>.

[2] Hannah Hartig and Jocelyn Kiley, “Confidence in Trump Dips, and Fewer Now Say They Support His Policies and Plans,” Pew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29, 2026,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6/01/29/confidence-in-trump-dips-and-fewer-now-say-they-support-his-policies-and-plans/>.

[3] Dana Fisher, “Rising Acceptance of Political Violence Promises Nothing Good for the U.S.,” *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27, 2025,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rising-acceptance-of-political-violence-promises-nothing-good-for-the-u-s/>.

[4] Tara Suter, “More Americans now say violence may be needed to get US back on track: Survey,” *The Hill*, October 2, 2025, <https://thehill.com/blogs/blog-briefing-room/5534844-americans-political-violence-survey-npr-pbs-marist/>.

不少民众开始为此做准备。美国知名投资人达利欧（Ray Dalio）认为，巨额财政赤字、惊人的贫富差距、法律和警察系统被用作政治武器等一系列指征表明，美国处于内战的边缘，它是“强硬右派和强硬左派之间的生存之战”。^[1]种种现象表明，美国政治文化正在经历威权化转向，政治暴力形成的恶性循环正在加剧。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通过民调等方法研究美国政治的激进化程度，他在2025年5月所做的民调显示，39%的受访民主党选民认为通过武力让特朗普下台是合理的；近四分之一的受访共和党选民赞成特朗普动用军队镇压反对其政策议程的抗议活动。总之，民主规范的侵蚀、政治暴力的常态化、制度信任的崩塌，都预示着美国政治可能进入一个更加不稳定、更加对抗的时期。

（二）促使所谓“自由国际秩序”陷入结构性瓦解局面

美国国内政治的动荡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国际层面，而“非自由主义民主”在美国的兴起，可能会导致西方所认为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彻底崩解。美国知名国际关系理论家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认为，特朗普是首位对“自由国际秩序”采取敌视态度的美国总统，他将终结美国作为这一秩序领导者的角色。^[2]特朗普第二任期进一步在外交层面落实“美国优先”路线，正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在确认其国务卿任命的国会听证会上所言，“我们花费的每块美元，我们资助的每个项目，我们推行的每项政策，都必须基于对以下三个问题之一的回答：它是否让美国更安全？它是否让美国更强大？或者它是否让美国更繁荣？”^[3]事实上，特朗

[1] Charles Bethea, “The Americans Prepping for A Second Civil War,”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4, 2024,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4/11/11/among-the-civil-war-preppers>.

[2] G. John Ikenberry, *A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rises of Global Or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256-257.

[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pening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designate Marco Rubio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January 15, 2025, <https://www.state.gov/opening-remarks-by-secretary-of-state-designate-marco-rubio-before-the-senate-foreign-relations-committee/>.

普第二任期开启后接连“退群毁约”，2025 年内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2026 年 1 月完成退出程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2026 年 1 月宣布美国再退出 66 个“不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由于美方迟迟未同意续约，导致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于 2026 年 2 月 5 日到期失效，给全球核军控和战略稳定带来严重潜在影响。曾任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本·罗兹（Ben Rhodes）认为，特朗普政府把盟友视为对手，打击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治理机制，“将国际关系视为收取保护费的勾当”，美国已历经 250 年日益多元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但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却在通过主动的倒退来实现闭关锁国。^[1]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对外还愈发展现出“新门罗主义”“新帝国主义”的取向，胁迫性、扩张性、掠夺性特征日益显现。2025 年 12 月发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所谓“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强调美国将重塑其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2]2026 年 1 月 3 日，特朗普政府悍然发动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袭击，绑架了委总统马杜罗夫妇，并力图霸占委石油资源。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并暗示不排除采取武力方式。2026 年 1 月发布的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等关键区域和节点的掌控。^[3]特朗普还反复宣称要使用“惩罚性”关税或军事力量来重新安排世界的边界。著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美国的帝国主义原本比较温和，主要通过安全联盟、自由经济秩序等方式实施主导，但特朗普却用一种“回到 19 世纪”的方式寻求领土扩张，甚至

[1] Ben Rhodes, “100 Days. That’s All It Took to Sever America From the World,”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27/opinion/100-days-trump-world.html>.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3] US Department of War,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January 2026, p.3, <https://media.defense.gov/2026/Jan/23/2003864773/-1/-1/0/2026-NATIONAL-DEFENSE-STRATEGY.PDF>.

威胁使用武力,这不啻为一种“新帝国主义”。^[1]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主席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认为,“特朗普针对全世界发动贸易战,试图侵占乌克兰的矿产,威胁格陵兰岛和巴拿马的领土完整,这表明国际秩序的既有规则不再适用了”,被自由派人士视为常态的相互依赖已经不复存在,欧洲人需要思考在自由国际秩序终结的“非和平时代”如何生存。^[2]

“非自由主义民主”对国际秩序的冲击还体现在意识形态竞争的重构上。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起,美国右翼民粹势力便有意识地促进跨国联动,支持英国改革党、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联盟党、德国选择党、荷兰自由党等欧洲右翼政党组织在本国拓展政治空间。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虽弱化了“民主对垒威权”的叙事框架,却流露出针对不同政治体制和文明的偏见,指责各国自由派精英“试图钳制右翼民粹政党的发展”,甚至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公开攻讦欧洲面临“文明消亡的危机”,并宣称要“在欧洲各国内部培养对欧洲当前发展轨迹的抵制力量”,帮助右翼民粹势力在欧洲等地区扩张、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极右政治联盟的意图更加明显。^[3] 在拉美,特朗普也力图通过“扶右抑左”“分而治之”的策略来支持右翼亲美势力强基、稳政和夺权,从而增强美国对地区事务的掌控力。

总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的“非自由主义民主”趋势日益增强的背景下,美国对外交战略凸显出越发显著的单边霸凌和霸道色彩,美国长期宣扬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被其自己所不断展现出的“强权即公理”做派所颠覆。

(三) 对中美关系构成复杂挑战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大国关系的深层次影响

[1] Francis Fukuyama, “The New American Imperialism,” *Persuasion*, February 11, 2025, <https://www.persuasion.community/p/the-new-american-imperialism>.

[2] Mark Leonard, “Europe after the end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Project Syndicate*, April 15, 2025.

[3] 参见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Andrew Roth, “Trump and Vance are courting Europe’s far right to spread their political gospel,” *The Guardian*,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feb/14/trump-vance-europe-far-right> 等。

越发凸显,“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主义”“民主对垒威权”的二元对立逻辑盛行,成为美国不断强化对“战略竞争对手”遏制打压的重要内在驱动力。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虽在表面上弱化了意识形态因素,但随着“非自由主义民主”在美国的推展,右翼民粹主义针对中国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的偏见和仇视特别是其试图构建一种偏重生活方式、宗教、文明维度的“中国威胁”叙事不容轻视。罗伯茨、班农等人诬指中国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所谓的“犹太-基督教文明”构成“威胁”,声称“我们与中国共产党无法共存”。^[1]多个民调显示,作为右翼民粹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白人福音派选民对中国持有最大敌意,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不仅是“对美国权力的威胁”,而且是“对白人基督教权力的威胁”。美国右翼政客还将“中国问题”置于美国“文化战争”的背景下,将中国和美国的“觉醒运动”相关联,如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构陷与中国有关的投资和企业是“觉醒”意识形态的重要外国来源,白宫副幕僚长米勒甚至妄称“共产主义的觉醒文化正在摧毁美国”。^[2]

虽然特朗普本人尚未对中国展现意识形态方面的敌意,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未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直接攻击,但他仍可能利用右翼民粹和反华势力对华发难。从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等战略文件看,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依然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鲁比奥等美国政府核心要员宣称中国是美国“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强大、最危险的势均力敌的对手”,特别是美国仍在亚太强化对华军事围堵和威慑部署,在拉美等地区加大排挤中国的力度,在经贸、科技、关键矿产、供应链等领域加紧推进对华“脱钩”,打压中国仍是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战略重点。同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执政班子中,有不少像鲁比奥这类的对

[1] 参见 Kevin Roberts, *Dawn's Early Light: Taking Back Washington to Save America*, pp.211-236; Jeffrey C. Alexander, "Raging Against the Enlightenment: The Ideology of Steven Bannon," *Culture Section*, Spring/Summer 2017, pp.24-28 等。

[2] 参见 Jiachen Shi, "Ron DeSantis Brings US China Policy into the Culture Wars," *The Diplomat*, June 7, 2023; David Gardner, "Stephen Miller Goes on Unhinged Rant About 'Communist Woke Culture' Destroying America," *Daily Beast*, May 2, 2025 等。

华鹰派，他们试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以集中精力对付中国，并可能会利用特朗普的“政绩焦虑”或外部事变，推动特朗普选择军事手段示强。^[1]此外，美方仍有进一步限制中美之间人文交流的趋向。2025年3月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赖利·穆尔（Riley Moore）等人提出法案，要求全面禁止中国公民获得美国留学签证；同年5月鲁比奥宣称要“大力撤销”中国学生签证，并对来自中国的签证申请者加强审查。值得注意的是，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还展现出对华“言虚行实”的一面。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着力渲染西方文明危机的叙事，凸显了所谓“文明冲突”和“制度竞争”的底色，实质上有针对性对中国的考虑。报告提出美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政府体制与“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在于保护美国的“体制性优势”；宣称要确保美国免受“敌对外国影响力”的侵蚀，打击“破坏性的宣传和影响力行动”以及“文化颠覆”（cultural subversion）；强调要清除在拉美地区所谓“敌对性的域外影响力”，限制或削弱“非西半球竞争对手”在地区的“势力存在”。^[2]事实上，加大对华遏压的意图已经在美国施压墨西哥减少对华经贸交往、逼迫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共建并裁定中国香港企业在巴拿马运河相关运营项目“违宪”以及大肆抹黑中国在秘鲁钱凯港投资项目等事实中得到充分显现。又如，美国拼凑所谓“硅和平”（Pax Silica）、“资源与地缘战略参与论坛”（FORGE）等新的“议题联盟”，虽未明确提出针对中国，但其背后对抗中国的盘算昭然若揭。

结 语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以来，美国向“非自由主义民主”演变进程明显加快。用美国学者的话讲，特朗普及其所带领的共和党正力图“利用宪法

[1] Alexander Langlois, “Under Donald Trump, Restraint is Winning,” *National Interest*, June 5, 2025.

[2] 参见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和法律的模糊性来达到威权的目标”，美国的民主体制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1]“非自由主义民主”在美国的兴起，不仅是特朗普个人的行事风格使然，更是美国深层次社会矛盾、制度缺陷和意识形态变迁的集中反映。事实证明，即使在一些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当意识形态极化、社会分裂、制度漏洞和政治机会主义相互叠加时，所谓的“民主衰败”同样可能发生。

同时也要看到，这一趋势的发展进程中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扩张和滥用权力的声音不绝于耳，很多社会机构仍在推进针对特朗普政府的诉讼。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意味着特朗普依据该法对外加征的“对等关税”“芬太尼关税”等相关关税违法，既是其关税政策遭受的重大挫折，也是其滥权行为遭遇的强力阻击。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提名的两位大法官在此次裁决中也认为特朗普越权违法。此外，《大美丽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在美国国会一波三折、艰难通过的事实表明，党派之间以及党派内部的分歧仍对特朗普的执政形成掣肘。马斯克和特朗普的一度关系破裂、曾被特朗普称为“共和党明日之星”的国会众议员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等MAGA派政客与特朗普的决裂等事例体现了右翼势力内部的矛盾，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所言，“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和它的科技兄弟之间的塑料友谊可能不会持久”。^[2]特朗普对联邦政府的调整，或将损害行政部门在航空管理、灾害应对、疾病预防、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治理效能，进而削弱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恣意“退群毁约”、悍然掳走主权国家元首、抢占别国资源、威胁吞并格陵兰等单边霸道行径，在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引发强烈不满和反对，加剧了美国与诸多盟友关系的裂痕。

[1]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The Path to American Authoritarianism*, p.51.

[2] Stephen Walt, “America Is Its Own Worst Enemy,”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12, 2025,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2/12/trump-democracy-america-own-worst-enemy/>.

美国“非自由主义民主”的演进是一个复杂的、尚未定型的历史进程。其最终走向将取决于多重因素的互动：保守民粹主义能否维持其社会基础，制度制衡机制能否发挥作用，反对力量能否予以有效反制，以及外部突变如何影响美国国内政治格局。面对特朗普的所谓“革命”以及美国“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兴起，中国需要深入辨析这一趋势带来的影响。特朗普再次执政背景下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思想光谱、政策主张和内部派系等问题值得持续关注，尤其是基督教民族主义、技术法西斯主义等对塑造美国变革底层逻辑有着重要影响的思潮动向。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美中博弈正面临“关键十年”，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更为复杂，美国右翼民粹势力对中国的恶意虚假叙事和对中美关系消极态度值得重视。中国需完善应对美国对华“叙事之战”的体制机制，着力推动同美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对话和务实合作，对冲右翼民粹势力宣扬的“文明冲突”论调。同时也要看到，特朗普意图重回弱肉强食式的丛林法则，大行单边霸凌之道，势必对美国的软实力造成严重损害。正如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深刻指出的，特朗普想让美国更加伟大，结果却可能让“美国世纪”以一种不体面的方式走向终结。^[1]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践行四个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行为的畸变，为新兴大国更积极地展现大国担当、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创造了空间。如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捍卫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

【收稿日期：2026-01-06】

【修回日期：2026-02-25】

（责任编辑：王霄巍）

[1]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The End of the Long American Century: Trump and the Sources of U.S.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104, No.4, 2025, p.70.